

## 一、前言

在這一百多年來之西方社會學的知識經營當中，Max Weber 的論述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地位。單就社會研究方法來說，Weber 的貢獻更是厥功至偉，其中又以「理念型」<sup>1</sup>(ideal type)的研究策略為最，但也爭議最多。綜觀過去對於 Weber 思想的研究，不管是持正面支持抑或反對批判的立場，從西方（特別德國）社會學科（或謂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歷史背景來進行抽絲剝繭的回顧與解析，可說是最為常見，甚至被公認是認識 Weber 的思想和確立其學術地位的不二法門。我們幾乎很難看到從當代的社會場景，尤其是以一具翻轉性的世界觀為基礎來重新評估 Weber 的學說。容或有之，也只是略加翻轉一下舊有的思維模式（如從所謂「後現代」的思維模式）來討論，結果總是有如新瓶裝舊酒一般，看不出什麼令人耳目一新且足以令人感動的新論點，始終還是在舊有的基本思維模式裡打轉（如 Hekman 1983, 1994; Koshul 2005）。

以這樣具評價性的認知為基礎，我嘗試採取另外的立場來重新評估 Weber 的「理念型」作為一種研究策略所可能開展的意義和視野。更為具體地說，應當是從後設理論的立場出發，為（特別是處於後現代場景裡之）人們的社會行動尋找更具初基性（也更為貼切）的基本身心狀態，進而透過如此的身心狀態來反映「理念型」可能蘊涵之更為深層的社會學意涵。在此，依我個人的見解，有兩種身心狀態的體現可以說是刻劃人之社會存在的關鍵：體現在認知上面的是模稜兩可(ambiguity)，而體

---

<sup>1</sup> 根據 Albrow 的說法，Weber 的理念型概念乃來自 Georg Jellinek 運用此一概念作為研究比較政府的基礎概念工具（Albrow 1990: 151；同時參看 Bendix and Roth 1971: 260-265, 305-310）。Ruciman(1972: 9n)則指出，雖然 Weber 此一概念來自 Jellinek，但採自 Simmel 的說法的，應更加值得注意。Bruun(1972: 210)也提示，在 1904 年，Weber 承認 Jellinek 是提出「理念型」一概念的先驅，但卻誤讀，而有著自己引申的內涵。總之，歷史的因緣際會不自覺地使得 Weber 的套用轉換成為被認定是屬於他個人的專利性概念。

現在情緒感受上的則是正負情愫交融(ambivalence)的情操。<sup>2</sup>顯而易見的，這樣的說法具有著濃厚之後設理論(meta-theoretical)的性質，乃是針對人的存在與社會的呈顯狀態鋪陳了特定的哲學人類學存有預設，可謂是用來從事理解、詮釋與分析人的社會行動以及具體社會現象背後的一種理念性的想像。依我個人的意見，承認這樣的理念性想像作為社會分析的前提「起點」依據，正是我們可以從 Weber 的「理念型」予以衍生剔透的圖像，而這也正是本文所意圖闡述的基本藍圖。

## 二、過去英語社會學界對 Weber 之「理念型」的提問重點

為了彰顯我在此文中之立論的分離點設準，我覺得，特別針對過去西方社會學界（尤其以美國與英國為主的英語社會學界）對 Weber 的論述（當然，特別是有關「理念型」的討論）做一個有選擇性且簡扼的描繪，應當是有所助益的。

在 1960 年代，英語社會學界（特別美國）對 Weber 學說的介紹與評論已逐漸浮現，對其學說內容的一致性或矛盾性，成為討論的焦點之一<sup>3</sup>（如 Bendix 1962; Bendix and Roth 1971），甚至到了 1980 年的開始，

---

<sup>2</sup> 有關我個人對「正負情愫交融」現象之社會學意義的闡述，參閱葉啟政(2013a)。

<sup>3</sup> 在 1920 年，芝加哥大學的理論經濟學家 Frank H. Knight 熱衷於探討經濟體系的歷史起源，特別是有關現代資本主義的部分。Knight 本人所具有的基督新教背景，使得他對經濟發展的文化因素，特別是來自基督宗教的救贖信仰觀念管道感到興趣，也因而迷上了 Weber 的學說，他於 1927 年翻譯了 Weber 的《一般經濟理論》（引自 Scaff 2014: 274）。接著，當時在德國海德堡大學(Heidelberg University)就讀研究所的 Talcott Parsons，也與 Knight 一樣，迷上了剛出版（1925 年）之 Weber 的《基督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乃於 1930 年將其譯成英文。這麼一來，Weber 這兩本著作的英文翻譯開啟了英語世界（特別是美國）對 Weber 之學說的興趣。尤其，1937 年 Parsons 在其著作《社會行動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一書中以相當的篇幅介紹 Weber 的學說，更促使美國社會學家對 Weber 思想的重視（同時參看 Derman 2012; Scaff 2011, 2014）。然而，在 1991 年的一篇論文中，Horowitz 卻弔詭地地下結